

圆你音乐梦 *Yuan Ni Yinyue Meng*

音乐自学丛书

主编：滕矢初

TONGSU

YINYUEXINSHANGZHINAN

通俗音乐欣赏指南

徐国康 / 编 著

西泠印社

圆你音乐梦 *Yuan Ni Yinyue Meng*

音乐自学丛书

主编：滕矢初

通俗音乐欣赏指南

TONGSU

YINYUEXINSHANGZHINAN

徐国康 / 编 著

中原工学院
中文藏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俗音乐欣赏指南/滕矢初主编;徐国康编著. —杭州:西泠印社,2004.4

ISBN 7-80517-604-3

I. 通... II. ①滕... ②徐... III. 流行音乐—音乐欣赏—指南 IV. J60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358 号

西泠印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邮政编码:310009)

责任编辑:侯 辉 封面设计:张 涛 责任出版:叶 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6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3 000

ISBN 7-80517-604-3/J·605

定价:12.50 元

前 言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音乐以其独特、美妙的艺术魅力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伴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聆听一场音乐会,会使我们陶醉其中;观看一场歌舞晚会,会使我们激动万分。演奏家精湛的表演,令我们羡慕不已;歌唱家动听的歌声,令我们跃跃欲试,这是因为音乐是美的艺术。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高层次的审美追求会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情操受到陶冶,生活也将变得更加丰富而充实。

“圆你音乐梦——音乐自学丛书”,面向广大音乐爱好者。它以丰富的内容,循序渐进的编排形式,深入浅出的语言,帮助你走进音乐之门,圆你音乐梦。

这套丛书包括《巧学乐理知识》、《巧学视唱练耳》、《巧学歌曲演唱》、《巧学歌曲伴奏》、《巧学钢琴弹奏》、《巧学手风琴》、《巧学电子琴》、《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欣赏指南》、《西方音乐欣赏指南》、《通俗音乐欣赏指南》等。

《通俗音乐欣赏指南》一书,从通俗音乐的特点出发,对通俗音乐的欣赏价值、欣赏方式及如何提高欣赏能力等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并就通俗歌曲和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爵士乐、摇滚乐、轻音乐等通俗音乐形式,进行有重点的分析和例举,力图使音乐爱好者在通俗易懂又轻松活泼的文字中,掌握、了解通俗音乐欣赏的方向和方法。本书对拓宽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欣赏视野和丰富音乐课堂教学内容,也有一定的学习和参考价值。

“圆你音乐梦——音乐自学丛书”可以作为学校、青少年宫、文化馆、社区等开展音乐活动的教材,也可供家长辅导孩子学习音乐和自学音乐者选用。希望得到大家的喜爱,也希望对书中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

《圆你音乐梦》编委会

2003年7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3
第一节 通俗音乐及其特征	3
第二节 我国通俗音乐的形成与发展	8
第二章	19
第一节 音乐欣赏的一般心理过程	19
第二节 通俗音乐欣赏的方式	28
第三节 通俗音乐欣赏的价值与意义	32
第四节 提高音乐欣赏能力的方法	42
第三章	45
第一节 通俗歌曲概述	45
第二节 通俗歌曲的分类	47
第三节 通俗歌曲的风格与艺术特征	50
第四节 通俗歌曲的词曲特点	53
第五节 通俗歌曲的演唱方法	58
第四章	63
第一节 灵动感人的爵士乐	63
第二节 激情狂热的摇滚乐	68
第三节 温馨浪漫的轻音乐	73
附录 一百首经典中文名曲赏析	79

引 言

音乐是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它可以让你兴奋、让你振奋、让你投入、让你疯狂，也可以将你从困苦中解救出来，赐予你坚定的信念。而最重要的莫过于音乐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体验美妙旋律给我们带来的愉悦感觉。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音乐正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适应现代人对音乐审美的不同需求。

通俗音乐作为音乐的一种门类，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断地流传和发展，深深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被亿万群众所喜欢和接受。据统计，目前我国带音响的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视、大型晚会中，通俗音乐的比例高达 80% 以上。在歌厅、广场里男女老少引吭高歌群情激昂，在活动、聚会时人们边唱边舞尽情享受。可以说，我国的音乐文化在上世纪末的最后 10 多年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裕了，大家都希望通过音乐追求精神和情感上的享受；二是由于通俗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在我国内地不再被视作毒蛇猛兽，而与其他音乐文化形式一样，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迅速的发展。所以，不能不说通俗音乐的传播对我国大众音乐的普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通俗音乐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音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报道，为了充分满足人们对通俗音乐文化的社会需求，繁荣通俗音乐的创作与演出，深入研究通俗音乐文化的发展前景，我国一批著名的高等音乐院校，如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在近年先后开设了通俗音乐专业并公开招收通俗音乐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可以断言：未来我国的通俗音乐将会沿着更繁荣、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几十年来，我国的音乐理论界和音乐评论界对“通俗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称谓及概念界定，进行过大量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论证与讨论。到目前为止，尽管在称谓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对这类音乐的特点和范围的基本认识却是共同的。可以说，用“流行音乐”这个词，是侧重强调了音乐存在的状态特征，即时效与传播的特征，就像我们生活中常说的流行款式、流行色彩、流行面料一样。台湾著名的词作家庄奴在回答青年学生什么叫流行音乐时说：“来了你挡不住，去了你留不住，这就叫流行音乐”——既通俗又形象。而“通俗音乐”的提法则侧重于

突出音乐作品的特征及表现属性,即从创作到表演具有丰富的生活气息、大众化的审美倾向和开放性、活动化的特点,其音乐往往通俗易懂,被绝大部分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音乐教育,但迫切需要音乐来丰富生活的人们所接受。

本书采用“通俗音乐”的称谓,就是从这类音乐的特征和属性出发,选取相对合理又约定俗成的表述方法,而不是科学的定义。因为对广大读者来说,定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对通俗音乐的欣赏获得音乐与心灵的交融。

第一章

第一节 通俗音乐及其特征

英文 Popular Music 这个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译成“通俗音乐”,部分辞书中也有译成“流行音乐”的,在公众称谓中用“流行音乐”的也不少。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专业音乐创作的作品称为严肃音乐,后来又称为高雅音乐;把一般不表现重大题材和思想内容的通俗易懂、情调轻松的音乐称为通俗音乐,例如小斯特劳斯的那些圆舞曲等等都归属这个名词之下。以后的通俗歌曲、舞曲、轻音乐、爵士乐、摇滚乐等层出不穷的群众性歌曲形式愈来愈多,而这些音乐往往带有很强的流行性、情感性和自娱自乐的特点。有一些媒体把这些都称为流行音乐,但这样容易混淆与严肃音乐的界线,所以,我们觉得用“通俗音乐”一词称这些音乐形式比较恰当。

人类的音乐生活可以追溯到远古,人类社会的音乐艺术是丰富多彩的。当我们审视整个音乐艺术天地,可以发现,它大致呈现为两个部分:一是民间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久远的乡村音乐),二是艺术音乐(或称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在这中间,有一个广阔的地带,那便是通俗音乐。我们很难给通俗音乐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它与艺术音乐以及民间音乐之间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组成一个五彩纷呈的音乐世界。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三者之间的分野还是十分清楚的。

早期通俗音乐的创作和演出多是商业性的,一般都在城镇中进行,因而有别于乡村色彩浓郁的民间音乐。同时,它不具有艺术音乐的那种规范性与稳定性。它的早期,在多种情况下只是口头流传。故此,又有人说,通俗音乐有别于艺术音乐和民间音乐,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大众音乐”。

据国外的音乐史家们研究,在公元前的古罗马、古埃及一带,以音乐为生的行吟歌手们在兴起的城市集镇间流动,他们在剧场和街市的“击”歌现象,为广大平民所喜爱。到了中世纪,通俗音乐几乎覆盖了广大的社会生活和艺术天地。

“通俗音乐”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据称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欧洲的报刊上。到了 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俗音乐名目日益繁多,风靡世界各地。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现代化电声乐器手段的使用,更使它插翅飞翔,无处不达了。

城市中密集的人口、巨大的销售网络、完备的传媒体系能使一首首作品、一张张唱片、一个个歌星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在一个广大的地域范围中流传开来。只有在城市的环境中才能造就“流行”，而这种“流行”也正是获取高额利润，维持这一产业的生存发展壮大的先决条件。

“流行”是通俗音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进入 20 世纪后，唱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普及使通俗音乐的传播手段发生了彻底的革命，真正形成了工业化通俗音乐产业。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日本发明了卡拉 OK 伴唱系统和“随身听”小型录音机，直接影响了通俗音乐的欣赏方式，使其变为一种更加个人化、体验化的娱乐方式。卡拉 OK 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通俗音乐的走向，在亚洲地区，唱片厂商大都十分重视制作那种适合于普通歌迷用卡拉 OK 演唱的歌曲。音乐电视的出现与传播制造出许多新的歌坛偶像，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揭示歌曲内涵的具有独立的表現手段和审美情趣的新型艺术形式。

现代电子音响合成技术使通俗音乐的音响变得异常地丰富奇特，它不受传统乐器物理特征的局限，能制造出任何一种想象得到的声音，与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大异其趣。如 MIDI 技术可通过预先编制好的数字化程序来操作乐器，演奏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难度音型和乐曲。

现代科技不但丰富了通俗音乐的表现手段，提高了制作的效率和质量，还直接影响到通俗音乐的风格。电子扩音技术是摇滚乐、迪斯科等强劲的通俗音乐所不可缺少的。对于这一类型的音乐来说，震耳欲聋的音量不仅是外在的传播方式，也是其风格形式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类音乐依赖于强大的音量，产生足够的刺激，使人之为之迷狂，随之起舞，这就是好动的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和迪斯科的根本原因。

通俗音乐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哺育催化下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用工业化方式来生产的音乐商品，是当代社会中获利最高的产业之一。作为一种商品，满足尽可能多的消费者的需求，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是通俗音乐发展的原动力。经过多年的摸索积累，现代通俗音乐产业已经形成了从市场预测、作品风格的量身定度、歌手包装、广告宣传、产品推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流程。

通俗音乐的历史不长，但发展很快，其根本原因是充分借鉴并创新使用了古典音乐创作的基本方法，并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与特色。民间音乐本身就是通俗性、大众化和富有亲和力的音乐语言，通俗音乐正是抓住这个特点，对民间音乐进行包装和改编，因此民间音乐对于整个通俗音乐的旋律风格和叙述方式的影

响是十分巨大的。

在 19 世纪上半叶,通俗音乐尚未形成独立的体裁形式。当时的音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俗化了的古典音乐和高雅化了的民间音乐。前者是将古典音乐中的一些篇幅短小、音乐语言通俗易懂的小品或选段加以改编,使之变得更简单,然后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使其为更多的人接受。19 世纪中出版的许多根据歌剧和交响乐片段改编的钢琴四手联弹乐谱就是供广大市民家庭在茶余饭后欣赏与消遣用的。后者是将质朴单纯的民间音乐用现代音乐手段加以美化包装,削弱地域色彩,使其能够在更大的范围里流行。如爱尔兰民歌《伦敦德里小调》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经过作曲家的改编后,在欧美各国广为传唱。到了今天,这种通俗化的古典音乐和高雅化的民间音乐依然在通俗音乐(尤其是器乐曲)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进入 20 世纪后,通俗音乐逐渐产生了一些独有的体裁形式,如爵士乐、摇滚乐、“叮砰巷”风格的流行曲等,开始了其独立发展的新时期。

美国黑人音乐在通俗音乐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整个通俗音乐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形式有:布鲁斯、拉格泰姆、爵士乐、节奏与布鲁斯等。爵士乐又可分为迪克西兰爵士、大乐队摇摆乐、比博普、冷爵士、自由爵士、艺术爵士和现代爵士等支系。摇滚乐占据了通俗乐坛的主流后,爵士乐开始衰落,但其对世界通俗乐坛的影响从未完全消失过。近年来,在中国的通俗歌曲中也能找到爵士乐的踪影。

“乡村与西部”音乐原是一种典型的处于原始状态的美国民间音乐。20 世纪 20 年代后,经过广播电台、唱片公司等媒介的发掘推广,很快进入了通俗音乐领域,成了美国通俗音乐中的一个重要分支。80 年代欧美流行乐坛的“世界音乐”潮流乃至中国的“西北风”中都可以看到民间音乐对通俗音乐的巨大影响。还有些民间音乐与通俗音乐完全融和为一体,为世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使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世界音乐开始如雪花般满天飞扬。比如,印度的音乐家将他们的印度教教会歌曲通过世界音乐的形式,充分展现宗教的神圣;中国作曲家何训田成功地将西藏音乐《阿姐鼓》推向世界等等。而拉美的一些舞蹈音乐,如探戈、伦巴和桑巴等就很难确定其究竟应归属于民间音乐还是通俗音乐的范畴。

20 世纪 20 年代初,以格什温的《布鲁斯狂想曲》为代表的美国交响爵士试图将爵士音乐语言与交响音乐的形式相结合。70 年代末兴起的新时代音乐更是综合了宗教乐和当代先锋派的音乐。

音乐剧、电影插曲的通俗音乐形式是随着 20 世纪初以来现代城市娱乐的兴盛而

发展起来的,由于有着传播上的便利,很快便在通俗音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城市舞厅中也发展出了许多重要的通俗音乐形式,如探戈、桑巴等各种拉美舞曲、摇滚舞曲、迪斯科等。

通俗音乐中有许多体裁是来自于城市街头青少年的自娱自乐形式,经过提炼加工和流行化包装而进入商业渠道的,如霹雳舞和莱普。这些充满活力而又极具时代感的城市亚文化为通俗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通俗音乐中还有很多纯器乐形式,如乡村音乐、爵士乐和各种舞曲。用管弦乐队演奏的抒情小品也被冠以“轻音乐”、情绪音乐(又称 EQ 音乐)的名称而纳入通俗音乐中。近年来,许多新成立的乐队与组合,成功地推出了不少专辑和演奏明星。

成年人虽然对通俗音乐不及青少年那样狂热,但他们同样需要用音乐来滋润自己的心灵,丰富精神世界。例如那些旋律优美、抒情性较强的通俗歌曲,常常会受到各个不同年龄层次听众的欢迎。一般来说,成年人对社会生活与情感的理解和认识更为深刻,一些情感丰富、寓意深刻的作品很容易在他们中间引起共鸣与认同。传统的民间音乐风格的通俗音乐由于其母语文化所特有的风格和审美特色,也对成年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此外,成年人对那些在其青年时代对他们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歌曲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留恋之情。市场中的“怀旧老歌”、“怀旧金曲”便是迎合这种消费需求的。因此,通俗音乐在迎合青少年审美情趣的同时,也顾及多样化的诉求层面。

通俗音乐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其中不乏对社会与生活的思考、对情感与人性的赞美、对理想与目标的追求及对时弊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精神风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些甚至因为具有典型的时代性而成为精品。

在我国,通俗音乐一般指在社会中广泛流行的,适合现代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口味的,通俗易懂的,抒情性、表演性、娱乐性较强的音乐。一般来说,其艺术生命力不长,往往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而新旧更替。

通俗音乐的范围包罗万象,就通俗歌曲而言,是指歌曲的内容满足了一定社会时期绝大多数群众的心理需求;体裁形式较为短小;曲调结构简洁流畅,富有民族特色;歌词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演唱风格多样,易为广大群众学习传唱的歌曲。这当中,有专门创作的通俗歌曲,如 80 年代以来的《军港之夜》、《纤夫的爱》等;还有中外影视歌曲,如《渴望》、《篱笆墙的影子》、《人鬼情未了》等,台湾的校园歌曲,如《外婆的澎湖湾》、《赤脚走在田埂上》等;以及大陆和港台歌星演唱的歌曲,如《穿过你的黑发的我

的手》、《红豆》、《爱你一万年》、《牵手》等；也有将一些中外民歌归为通俗歌曲的，如《北国之春》、《红河谷》。就器乐而言，主要包括中外舞曲，如，“舞之王”中的《动起来》、《爆裂旋风》等等，轻音乐作品（其中包括根据古典音乐、艺术歌曲、民间歌曲或民间器乐曲改变的轻音乐），如英国的《夏日最后一朵玫瑰》、意大利的《重归苏莲托》，浪漫小曲《少女的祈祷》、《绿袖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通俗钢琴曲《秋日私语》、《水边的阿狄丽娜》等，还有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新世纪音乐以及各种舞厅音乐等等。

通俗音乐内容多、范围广、形式多样，大多具有健康向上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情趣、情感和美好的追求。但也有少数通俗音乐作品较为颓废、庸俗或格调低下，我们在欣赏过程中应注意分析和甄别。

通俗音乐作为受到大家普遍喜欢的一种音乐体裁与形式，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1. 通俗音乐是高雅音乐（或称古典音乐、艺术音乐）与民间音乐的相对概念。
2. 通俗音乐就表现形式来说可分为通俗歌曲和通俗器乐曲（包括舞曲）。其中通俗歌曲由于好听易唱不断翻新，所以相对来说流行较快，而通俗器乐曲往往是爱乐者自我欣赏以及作为背景音乐或迪吧、舞厅音乐使用。
3. 通俗音乐由于是“大众化的音乐”，故大多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以表达情爱的作品居多，但也有描写理想、伦理、思乡、友谊等内容的作品。一般来说，表现内容与手法比较丰富多样。
4. 通俗音乐的结构大多比较短小精练，许多作品富有动感。其中通俗歌曲的歌词通俗易记，比较口语化，旋律流畅，音域不宽，只要情感投入往往有意想不到的表演效果。而通俗器乐曲则大多优美动听或富有动感，适合于休闲和娱乐。通俗音乐的动感性特点使它成为现代人自娱自乐、放松身心的最佳选择，时下盛行的唱卡拉OK、迪厅蹦迪就是很好的例证。
5. 通俗音乐在伴奏和配器方面，依赖于现代电声与高科技的合成器技术，在音色的变化和效果渲染方面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6. 通俗音乐作为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和参与性。在大型的音乐会、歌会或歌星的专场演出中，灯光、舞美、服装、舞蹈、音响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加上演员与观众的互相交流，往往产生万众欢呼、群情激昂的艺术效果，这在高雅音乐的演出中是很少见的。

了解了通俗音乐的基本特征，可以使你在欣赏表演中从“光看热闹不懂门道”的单纯感官欣赏逐步走向情感和理性欣赏。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歌，每一代青少年都有为之迷狂、为之倾倒的旋律和偶像。

随着时光流逝,昔日的你从翩翩少年逐渐成长为成熟的中年人,而那些陪伴着你度过梦想、苦闷、彷徨或激动的青春年华之歌将会伴随着终身,成为你永远美好的回忆。

第二节 我国通俗音乐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通俗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大约有 60 年左右的历史,它主要产生于上个世纪的 20 至 30 年代,改革开放后的 10 多年间是我国通俗音乐发展的高潮期。

1903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同意开设属于西学的“乐歌”课,从此学堂乐歌作为一种知识而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个人谋生的手段被关在学堂门外了,音乐(或音乐的代表)与其他知识一样光明正大地登上了文化舞台。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被高高举起,引进西方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音乐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在教育领域扎下根来,并开始建立体系。1927 年,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20 世纪初,尤其经过“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市民阶层的通俗音乐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出现了许多演奏江南丝竹音乐的小型丝竹合奏社团,其代表性的曲目有《熏风曲》、《欢乐歌》、《三六》、《行街》等。以广州为中心的粤港地区则出现了不少以演奏广东小曲(俗称广东音乐)的小型丝竹合奏社团,其代表性的曲目有《旱天雷》、《倒垂帘》、《雨打芭蕉》、《赛龙夺锦》等。

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流入和通俗性歌唱活动的迅速发展,各地盛行传唱各种城市小调。这时的歌曲,大多以民间流传的所谓各种古曲、小调填上新词的方式来演唱,主要有《茉莉花》、《孟姜女》、《无锡景》、《五更调》、《小放牛》、《满江红》、《苏武牧羊》、《凤阳花鼓》等等。刘复、李家瑞编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共收集了 11 个省 6000 多首这类城市小调的曲词。另外,以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为主,为了推进“新学”,为了向青少年进行改革的启蒙教育,各地以新学堂为阵地,也编写、出版和传唱了多种多样的“学堂乐歌”。这些歌曲大多以日本、欧美的大众歌曲填上新词,以集体演唱方式来表现,主要有《何日醒》、《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扬子江》、《送别》等等。

五四运动后,随着反帝反封建群众革命斗争的深入,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活动迅速开展起来。这些歌曲都延续过去的“学堂乐歌”那种填词歌曲的方式编写,其曲调既有过去流行的城市小调和学堂乐歌,也有本国本地区和外国的革命歌曲,如《马赛曲》、《国际歌》、《红旗歌》等。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歌曲是《打倒列强》、

《工农兵联合起来》等。这些革命歌曲的演唱,已不再局限在学校范围内,而是扩展到各种群众性场所和集体活动中,听众也从知识阶层扩及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因而,这些歌曲形式比较简短,一般是不带伴奏的通俗歌曲。这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和以填词编写的歌曲传统,在当时红军革命根据地和东北抗日联合义勇军中一直保持着。

三四十年代,当学堂乐歌衰落之时,艺术歌曲、儿童歌舞表演等却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参天大树。一些从国外回来并受过西方音乐系统训练的作曲家如萧友梅、黄自、赵元任、李叔同等为中国初期的歌曲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萧友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他的作品虽然受西方音乐的影响很大,但已经注意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因素。黄自是受过西方音乐专业教育的作曲家,音乐创作十分丰富,《花非花》、《玫瑰三愿》都是其脍炙人口的作品;赵元任的《卖布谣》、《叫我如何不想他》等作品是运用我国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的元素与西洋创作手法相结合的范例。以上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至今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并永远是我国音乐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一、黎锦辉与 30 年代的流行曲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是我国通俗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主要代表人物黎锦辉是我国通俗音乐(当时又称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1891 年,黎锦辉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学习古琴等民族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花鼓戏、湘剧、汉剧等地方戏曲音乐曾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1927 年他创办并组建了“中华歌舞学校”和“中华歌舞团”。1929 年组织并领导了“明日歌舞剧社”在上海和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黎锦辉热衷于新音乐运动,积极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并进。为此,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如《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等,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大陆和香港、南洋一带广为流传,深受民众特别是少年儿童喜欢。这些作品大多是以表现儿童天真纯美的心灵和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思想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旋律简洁明快,形象地反映了童心、童趣和童真,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先生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风格和传统。在儿童歌曲的创作中,黎锦辉将民歌、城市小调和部分曲牌的元素成功地糅合在音乐语言之中,开创了我国歌曲创作的民族化的先河。

30 年代的上海是沿海最繁华的中心城市,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和外国娱乐性歌舞音乐的传入,开始萌生了中国最早的娱乐性通俗歌曲和歌舞音乐。领导“明月歌舞

剧社”的黎锦辉继儿童歌舞创作之后，逐渐步入了通俗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作品，当时被称为流行曲或时代曲，实际上它标志着中国通俗音乐（歌曲）的诞生。“明月歌舞剧社”是我国通俗音乐童年时期的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都曾在该剧社演唱，著名音乐家聂耳也是从这里起步走上了音乐创作之路的。

黎锦辉的流行曲创作奠定了我国当时通俗音乐的基本风格与特色，即民间旋律与外国歌舞，如狐步舞、伦巴舞、探戈舞音乐相结合。在配器上模仿美国爵士乐风格，有些作品甚至完全照搬外国音乐，只是添填新词，如《特别快车》、《蔷薇处处开》等。这些音乐通过“剧社”的演出，特别是唱片公司的灌唱，得到迅速流传。但由于部分作品格调不高，充满了庸俗和低级趣味，受到了当时文化教育界、音乐界和舆论界的强烈批判。

抗战时期的上海被称为“孤岛”，这类平庸低级的靡靡之音的流行实际上已成了瓦解人民抗日斗志的麻醉剂。为此，聂耳就曾撰文怒斥这类作品带来的危害，并以自己的热血行动和富有激情的创作掀开了抗日救亡音乐的新篇章。

二、抗日救亡群众歌曲的创作与流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大肆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引发了全国民众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聂耳、任光、安娥、张曙、吕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音乐工作者跟广大工农民众站在一起，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救亡歌曲，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与决心，从而奠定了我国歌曲创作的新走向。

聂耳是抗日救亡歌曲创作中的佼佼者，他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所写的30余首歌曲，绝大部分是广为流传的成功之作。《毕业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的作品。《飞花歌》、《塞外村女》等则是民歌风抒情歌曲中很有特色的作品。

随着当时国内“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一大批音乐的热血青年积极投身于以抗日救亡歌咏为主题的“新音乐运动”。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等等，都以通俗简洁的音乐语言，铿锵有力的节奏表达了人民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像黄自作曲的《抗战歌》、《九一八》、《热血歌》，陈洪作曲的《冲锋号》，何安东作曲的《全国总动员》等爱国歌曲，也都是以群众性的通俗歌曲形式创作的，它们对全国人民和广大爱国青年起着鼓舞和激励的重要作用。

当时还出现了一批艺术歌曲，如前面所提及的黄自的《玫瑰三愿》、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我住长江头》等。与此同时，这些音乐工作者还逐步介入了

当时以电影或戏曲插曲为主要媒体的通俗音乐创作。例如聂耳的《梅娘曲》、《告别南洋》、《铁蹄下的歌女》，任光、安娥的《渔光曲》，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保卫马德里》，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春天里》，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等等都是为进步电影所作，而且至今仍焕发出不朽的艺术光华。

自抗日战争以来，以延安为中心的进步音乐工作者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继续沿着抗日救亡音乐的方向发展创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郑律成的《延安颂》、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军民大生产》、《南泥湾》及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等，显示了解放区革命群众音乐创作的繁荣景象。

总之，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的通俗音乐创作主要是以黎锦辉为代表的流行曲和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流行曲借助西方通俗音乐的创作方式与表现手段，并注重融入民歌化的元素。而群众性歌曲则以西方进行曲及民歌为蓝本，创作上呈现了民歌化和进行曲化两种趋向。

由此可知，从 3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的通俗歌曲是朝着一条不同于欧美各国通俗音乐的道路发展的，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欧美各国的通俗音乐从本世纪以来基本上采取与严肃音乐分道扬镳的方式，主要为了适应城市娱乐生活的需要，随着满足市民娱乐的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些音乐主要依靠从事通俗音乐的歌星、乐手自编自演的方式产生，依靠在市民娱乐场所（如酒吧、舞厅、夜总会等）的表演及电台广播、唱片发行进行传播。这些音乐的艺术风格大多数是与歌舞表演或市民群众自娱的社交舞密切结合的。而中国 30 年代后半期以来的通俗歌曲，主要是由严肃音乐的音乐家们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 and 为了满足城市市民生活而发展的电影的需要，主要由专业作曲家或歌曲作家创作，依靠开展群众歌咏活动的形式来传播的。它的艺术风格大多与群众性的舞蹈或歌舞表演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更接近于进行曲和民歌或比较简单的艺术歌曲。

在这时期数以千计的中国通俗歌曲中，也有少数电影歌曲表现出明显的受外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影响，如《何日君再来》、《夜上海》、《莫忘今宵》、《香格里拉》等等，反映了以上海上层社会为代表的少数剥削阶级的精神生活和趣味追求，其影响当然也扩散到一般的市民阶层中。

三、新中国成立后至 1976 年间群众歌曲的创作与流行

全国解放后，我国群众歌曲的创作日益发展。《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作品从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神风貌。随着音乐文化事业的普及和电影、戏曲、歌剧创作的繁荣，一大批深受群众喜

爱的歌曲如《毛主席派人来》、《马儿啊你慢些走》、《长征》组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及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等等,在表现手段上也呈现出齐唱、合唱、独唱、重唱、表演唱等多样化的体裁。部分作品由于重视民族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深受广大群众喜欢,并经由广播传递,迅速流传成为群众集体歌咏的最普通的音乐生活方式。但由于当时政治和历史上的原因,娱乐性较强的通俗音乐仍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况。即使在电影歌曲方面,一些偏重于抒情、委婉的歌曲往往会被认为是感情不健康的“软歌”而遭到批判。

文革期间的歌曲创作,在前期中期尚有一些佳作,如《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大多收集在《战地新歌》歌曲专辑中。但随后抒情作品日益减少,“政治运动式”的歌曲充塞歌坛,使音乐创作一度陷入低谷。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和文革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文艺复兴提供了宽松和谐的环境。当时,由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的《祝酒歌》,由于表达了全国人民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和为实现四化甘洒热血和汗水的决心,而唱红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最通俗最流行的好歌。

四、新时期通俗音乐的发展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肃清过去极“左”的思想倾向的同时,全国上下呈现出“改革、开放、搞活”的生动局面,为我国新时期的音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由于当时全国上下百废待兴,所以西方的通俗歌曲及香港、台湾的各种通俗歌曲都随着唱片、盒式录音带及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体手段大量地涌入内地。其中传播最广的是邓丽君的作品。邓丽君的声音甜美温柔,亲切可人,舞台表演活泼多姿,很快在内地获得了广泛的流传。她的演唱方法、演唱风格对我国通俗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第一代女歌星程琳等就是先从模仿邓丽君的演唱而进入歌坛的。港台歌曲的进入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群众审美能力、艺术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希望作曲家们提供既能反映新时期火热生活和社会风貌,又能满足多样的审美需求,旋律优美动听,感情真挚而又易于传唱的新的通俗歌曲。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又逐渐出现了一批借助于影视传媒颇受群众喜爱的通俗歌曲和轻音乐作品。施光南、王酩、王立平是当时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作曲家。特别是王酩所写的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和张丕基在电视风光片《三峡传